

贪创生
著

新方志编纂研究与实践

山西人民出版社

新方志编纂研究与实践

贪 创 生 著

一九九三年五月

晋新登字6号

新方志编纂研究与实践

负 创 生 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运城报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875 字数: 195千字

1993年5月第1版 199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

ISBN 7—203—02478—4

K·132 定价: 6.00元

序

李裕民

方志的渊源，说法很多，有源于《禹贡》、《山海经》、《周官》、古诸侯国史等说，我认为都难令人信从。从出土的战国秦汉的地图与古代图经对比考察，方志应渊源于地图。在这些古地图上，除了城邑、山川等地名之外，还根据不同的需要标上物产、古迹、山河走向等内容。当需要附注的内容增加到图内放不下的程度，自然会转移到图外的空白处，这就成了最早的图经，经即图的说明。

目前所知最早的图经，是东汉时期的《巴郡图经》。从汉到隋唐五代，是方志的早期阶段，或者可以称为图经阶段，所记内容基本上不出地理范畴。

从宋到清是方志发展阶段，记人记事的内容大量增加，成了史的组成部分。

自民国至现在，是方志发展的新阶段，增加了新内容，如工业、商业、交通、矿冶、党派、警务等，吸收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如现代的图、表、照相，经过测绘的地图等，此时的方志突破了史、地范畴，成为熔多学科于一炉的乡邦文献。

方志渊源流长，研究方志的历史却相当短。清代是方志研究的第一阶段，章学诚提出较系统的方志理论。主张按史体撰写，戴震强调从地理角度去纂修。

Ey/666

民国为第二阶段，将方志作为独立的学问去研究，梁启超首先提出方志学的概念，李泰棻写出了第一部《方志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为第三阶段，特别是近十几年来，出现了空前的研究热潮，专著和期刊各有几十种问世，论文更不胜数，重点探讨方志的继承与创新，尤其是新方志编纂问题。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一、人员众多，不仅有专家学者，更有大量的修志人员参加。二、成立了许多地方志协会（或学会），经常进行各种形式的学术讨论会。三、研究与实践相结合。通过各种志书的评议会，不断改进志书编修水平，往往一部较好的志书，过不了多久即被别的志书超过。

这一阶段的成绩巨大，缺点也不容忽视，主要是：一、缺乏海内外的交流，台湾、日本、韩国等都编修了许多方志，发表过不少研究方志的论著。二、论著虽多，精品有限，象章学诚式的时代公认的大家尚未出现。三、方志界的刊物不少，但它的主要缺点却不容忽视：①一般不重视旧志的研究，没有继承，如何创新？②没有开辟各种争鸣栏目。缺乏争鸣，怎能提高？③缺乏批评文章。文艺要繁荣，必须开展文艺批评，方志亦然。只有纠正上述缺点，才能使方志研究跃上新的台阶。

山西方志的编写，就数量和质量而言，约居全国各省的中游。现存各种方志近五百种，已佚方志三百多种。其中，《汾州府志》、光绪《山西通志》堪称名志，刘文炳的《徐沟县志》也为民国志书中的佼佼者。近年来修志工作上马较早，已出和将出的县志有二、三十部，有些志书质量较高，但尚未挤入名志行列。从山西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状况

看，取得这样的成就已属难能可贵了。

山西方志的研究起步较晚，民国时郭象升在《山西各县志书凡例》中表述过独到的见解。近年来，研究者大增，发表不少论文，有些论文在国内有一定影响，但结成论文集出版者，尚未见到，有之，则自创生始。

我和创生对方志有共同的爱好，认识已经多年了。他虽年已半百，可精力过人，担任运城地区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常去各县指导县志编写工作。1986年主编《运城地区简志》80万字，内部出版，这在全国地区级志中属第二家，要是当时抓紧修改，正式出版，影响就大得多，想到这点，他至今感到遗憾。办公室主办的《河东史志》，在山西省地、市方志刊物中有首创之功。这几年，连续主编出版了《河东名胜诗抄》、《河东名胜大观》、《河东烈士》等书，主持点校了《蒲州府志》、《裴氏世谱》。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又撰写了数十篇论文，对新方志的编纂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现在即将出版的论文集便是他十年苦心钻研的结晶。对于此书质量如何，我不想多加评论，留待读者自己去品尝。我很佩服创生的勇气，敢于第一个推出论文集，这是继第一个地区志、第一个地区地方志刊物后的第三个第一。既然是第一，就难免有不太成熟之处，我希望此书的出版，能引出更好的著作来，使山西的地方志研究达到更高的水平。

一九九二年十月十八日于山西大学

自序

我于1981年10月从事地方志工作，一开始就是地区地方志办公室的主要负责人。期间，我把相当多的时间放在宣传、发动和组织地直及各县（市）地方志书的编写上。因而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没有更多的精力，同时也确实是疏忽了对新方志理论的研究和探讨。

但十余年来，我出于革命的事业心和对方志事业的极度热爱，还是千方百计的挤时间，运笔撰写了有关地方史志的文章（含讲话稿）和论文60余篇。而真正悉心探索新方志编纂和理论研究，乃是近几年的事。之前，基本上则多从一个组织者的角度，去处理和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因而所撰之文大都缺乏深度和个性。此次选入《新方志编纂研究与实践》一书里的文章共32篇，在全国有关地方志学术研讨会上宣读过的5篇，省地方志理论学术研讨会上宣读过的3篇，省级以上刊物和方志书稿中选入的14篇。也有一部分文章从未在任何刊物上发表过。在本书收录文章中，还有3篇是与人合写，自然凝结着志界友人的巨大劳动，但为从多角度能较全面介绍自己对修志实践的探索，故仍予以收录。

作为《新方志编纂研究与实践》一书的命题，含量性非常大，笔者绝非有能力探讨这样大的问题。而仅欲集10余年来参与地方志工作组织实施和编纂实践之活动，提供给方志界。希望在目前新方志编纂和研究中，能起到一丁点儿抛

砖引玉的作用，那怕是属于教训之例。本着这一指导思想，我选录了数年来亲自撰写，而着重反映探讨新方志性质、功能、指导思想、资料征集、人才培养、总体设计、志书编纂、方志评论、志稿修改以及提高志书质量等方面的文章，集结成这本小册子。就算我这位从事地方志工作的“新兵”，对新方志编纂研究一些有关问题不成功的探索吧！

我从事地方志工作已有11个春秋，但对新方志编纂和理论研究，确实还是一个“新兵”。本书提供给方志界的一些文章，涉及到新方志理论问题，以及对一些志书（包括未出版的志稿）的评论，实属探讨性的，观点不见得正确，错误则肯定难免，敬请同仁指正赐教。笔者急切诚望志界同仁，都来关心新方志学术理论的研究，以改变目前新方志编纂实践与理论研究不大相适应的状况。

作 者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目 录

序.....	李裕民 (1)
自序.....	(5)
地方志性质探索.....	(1)
试论新方志如何体现修志的指导思想.....	(12)
地方志的功能首先是“资治”作用.....	(21)
编写地方志要为当前的经济建设服务.....	(31)
新方志中经济诸志刍议.....	(32)
志书质量与修志人才.....	(39)
志书质量与资料工作.....	(55)
地区志总体设计中一些问题的构想.....	(68)
“文章已满行人耳”	
——析梁寒冰同志对丰富马列主义方志学的贡献	
.....	(77)
新编志书如何体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90)



地方志的概念起源与发展.....	(97)
谈谈编写专业志的方法.....	(112)
地方志书记载粮食问题的一孔之见.....	(128)
浅议编好《教育志》.....	(133)

小议史和志的区别.....	(137)
---------------	---------



记述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成功探索

——《湘潭市志·中国共产党篇》(终审稿)读后	(139)
---------------------------------	---------

志书突出时代精神探索

——《襄汾县志》读后.....	(146)
-----------------	---------

关于提高部门志质量的几个问题

——《平陆教育志》(稿)读后.....	(156)
---------------------	---------

一部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好志书

——评新编《曲沃县志》.....	(161)
------------------	---------

对《山西省志》编纂方案的一些意见..... (169)

《益阳地区志》(终审稿)框架结构评述

——《益阳地区志》读后.....	(173)
------------------	---------

《千阳县志·工业目》立目琐议及其它..... (180)

县志篇目设置的科学性问题

——兼谈对《武乡县志》篇目设置的意见.....	(185)
-------------------------	---------

《大宁县志》篇目设置的科学性..... (194)

县(市)教育志篇目的修定和设置..... (202)

县改市后志书总体设计构想

——《运城市志》(稿)内容处理的一些问题...	(207)
-------------------------	---------

浅论县志初稿的后期加工

——兼谈《河津县志》(稿)的修改.....	(212)
-----------------------	---------

※ ※ ※

古蒲州城的形成及变迁·····	(220)
历史名城——解州·····	(230)
中条山战役始末·····	(237)

※ ※ ※

努力提高我区志书的编纂质量

——在全区第五次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50)

充分发挥志书的社会效益，搞好志后工程

——在《永济县志》出版发行大会上的讲话（节
录）····· (263)

※ ※ ※

附录：

广阔志坛任驰骋·····志军 (267)

后记····· (272)

地方志的性质探索

一、历史上的属性之争

地方志的属性问题，通俗说来，就是地方志到底是“史书”，还是“地理”书，或者是一种其它什么书。这个问题，在我国地方志的发展历史上，是有不同的看法的。

“按照封建社会中的传统观点，方志属于地理学的范畴。历史上的许多公私目录，从《隋书经籍志》、《崇文总目》到《四库全书总目》；从梁阮孝绪的《七录》、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明焦竑的《国史经籍志》，到清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孙星衍的《孙氏祠堂书目》、张之洞的《书目答问》等，都把地方志归入地理书类。”①唐、宋、元、明、清各代，一些方志编纂和著录史籍者，也往往有把方志归入地理门类的。如元代戴良《重修琴川志·序》云：“古者郡国有图，风土有记，所以备一方之记载，今之志书，即古之图记也。”到了清代，考据之学盛行，一时名家辈出，形成了我国学术史上的一种思潮。这一学派，渊于清初顾炎武，其代表人物是毕沅、戴震、洪亮吉等，他们主张方志以载古今地理沿革为主，“一方之志沿革最要”，“地志者，志九州之土也”，“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

志事已竟，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②

这些主张，其核心是重视地理历史沿革及其考证，轻于史事记略。他们认为，方志就是地理沿革之考证。扬州学派焦循，一生崇尚戴（震）学，他在修志研究中，倾向于戴震的考据学修志流派。他说：“郡志为土地之书，宜先释地，为嘉靖十二年之郡志，则嘉靖十二年见在之城郭、河渠、都里、疆域，以及寺观、桥梁、田赋、户口，皆目验而知，实莫实于此矣，是必按而记之，书其实迹，不厌于详，不嫌于琐，是为所见异辞也。”③焦循在志书的古今和详略问题上，主张不泥古，不唯上，这一点优于戴学。但其对地方志的科学属性的理解，同地理学派是一样的。这种学派主张博取典籍，而对地理沿革详加考证，“检书儿几万卷，方事编辑”，以此来“补正史所不足。”“如前人无憾，则但当续所有，前人有阙，但当补所无。”由于他们崇尚考证的基本资料，大都来源于典籍，所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所编志书大都有脱离现实，无真正时代特点之弊，“资治、教化、存史”的实用价值不大。后人所编志书，也确有受其影响的。光绪五年版《河津县志·凡例》云：“职方掌九州图籍，而籍不先图，有图而后山川形势、远近、险夷可得而知也。兹并分野，列为廿图，俾观者瞭若指掌。”④说明也是偏重于地理沿革的考据。而今，将地方志看作地理之书，还是史书等，其概念仍有犹未明决者。

然而，认为地方志是一种史书，则历代不乏其人，且为其古今之正统看法。宋人郑兴裔云：“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⑤这是因为到了宋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地方志的体例也已

发展成为反映一地域各方面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著述了，绝非图经、地记所能容纳得了的，因而人们对地方志属性的认识，在理论上也逐渐有所升华。明乔应甲万历《猗氏县志·序》云：“邑之有志，郡国之有史，家之有谱。”⑥明吕调元《襄陵县志·序》云：“郡邑有志，犹国有史，所以昭往彰来，贵实录也。”⑦明郭景昌《河津县志·序》云：“志与国史相为表里，而纂言记事，所以垂久远，昭劝惩也。”⑧明朱睦《万卷堂书目》的目录分类，首将“方州之志”从地理类析出，独立为史部从属一门，始辟专目等等。到了清代，这一问题更引起了历史学界、地理学界和方志界人的注目，多数人已清楚地认识到地方志的属性是属于史学范畴了。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与戴震观点完全对立的著名的历史学家、方志学家章学诚。

在我国地方志的发展历史上，章学诚对方志理论的研究造诣至深，首创了“方志乃一方全史”⑨之说，这是对地方志的性质（即属性）所下的定义。其意在于将地方志列入史的范畴，这也是章氏方志理论的核心。章学诚不同意将方志列入“舆地图经”门类，看作地理专书，并多次提出方志的性质应该是“志属信史”、“志乃史裁”、“志乃史体”、“志者，史之一隅”等。他认为“郡县之乘，即封建时列国史官之遗”，并指出“近代修志诸家，误仿唐、宋州郡图经，而失之者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之《乘》，楚之《杻杻》，鲁之《春秋》，是一国之史，无所不载，乃可为一朝之史之所取裁。”⑩他还认为，史的种类很多。但方志是其中的一种，“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

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⑪他尖锐地指出：“志为国史举全体，陋儒误认为图经，司书版图有专职，如何方志混黑白。”^⑫“是方志与图经，其体截然不同；而后人不辨其类，盖已久矣。”^⑬“方志一家，宋元仅有存者，率皆误为地理专书，明代文人见解又多误作应酬文墨……凡修方志，往往侈为纂类家言。纂类之书，正著述之所资取，岂可有所疵议？”^⑭等等。章氏改变了历来把方志归入地理书专类的观点，给予方志在史学领域以一定的地位和作用，对后世修志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清乾隆乔光烈、润齐氏《蒲州府志·序》云：“天下郡国皆有书，盖本于周官四方之志。”^⑮《蒲州府志·发凡》云：“志为郡史，不可或缺。”“志乘之学，地理为难。”^⑯清光绪沈承恩《平陆县续志·序》云：“《周官》职方氏掌天下之地图，辨其邦国人民财用之数，故五等诸侯各有国史以纪事。”^⑰就是遵循了章氏方志理论体系之基础结晶。

介于以上二种认识之争的，民国时期著名学者黎锦熙先生在其《方志今议》中又提出了“方志为物、史地两性兼而有之”的见解。他认为地方志是“地志之历史化”，“历史之地志化。”著名地理学家陈正祥教授似乎倾向于黎先生的观点。但又提出其不同的见解。他说：“关于中国方志的性质，包括它究竟是历史抑或地理，过去的学者们争论已多，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并不重要，正同大学地理系之应在文学院或理学院一样的无关宏旨。事实上，方志所包含的部门甚广，远超出历史和地理的范畴，故颇难断定其归依。”^⑱陈教授这一独有的见解，同现代一些地方志的研究者，提出方志为

地方“百科全书”之类，其基本意思是一致的。这种对地方志属性的论述，确有一定的独到之处，也符合其现代修志实际。这是对地方志这门科学的研究，又深入了一步，前进了一步。但我认为，陈教授的这种见解，是否没有完全涉及到地方志归依属性的本质方面。我觉得地方志作为一门科学，还是应该有自己的属性归依的，否则，它就应该是独立的。我仍同意地方志归依史学之范畴，我同意章学诚先生关于“志属信史”、“志乃史体”、“志乃史裁”、“方志乃一方全史”等说。但我并不否认地方志这一特殊的体裁，同“史书”之体既有联系，而又有一定的差别。

二、史体和志体之说

80年代初期一开始修志，就存在着一个史体和志体的争论。而且，一直延续到现在，修志界仍有议论史体和志体之说。既然，方志属于史学范畴，那么为什么还存在着史体和志体的问题呢？我的理解，即志体是史体的一种特殊方式，有它殊同之处。不论是写史也好或写志也罢，它们之间的异同点是应该弄清楚的。这样才能深刻理解地方志的性质。

1984年7月18日，梁寒冰同志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史和志，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有很大的区别。历史著作是探讨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它是采用论证来说明历史发展规律的，其中包括特殊规律和普遍规律。地方志显然不能采取这种方式，地方志基本上是资料的科学排比，从资料的排比里边体现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这一点不同于历史，这是两种不同的体裁”。他还说：“有人说地方志是一方之全史’，又有人说，地方志是‘一方之百科全书’，两种说法

都有一定的道理，却没有回答史与志的区别与联系。”“历史科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是探索历史发展规律的，编修地方志不同于研究历史科学，它不要求探索和论证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地方志按其性质来说，它是一种资料性的书”。“地方志……有它特殊形式或特殊体裁。史与志有联系又有区别，但它们毕竟是两种不同的体裁。”^⑩这就十分明确地指出了史体与志体的区别和联系。

章实斋先生是清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方志学家，可谓集我国历代方志学家研究成果之大成。他提出了“方志为国史要删”，^⑪“方志为古国史”，^⑫“志乃史体”，“志乃史裁”，“志属信史”的精辟见解。认为修志即补“国史要删”，是治史。因而他在修志中倡导恪守“史家法度”。但他仍然十分注意正辩史体和志体之界，他说：“封建罢为郡县。今之方志，不得拟于古国史也。”^⑬他还说：“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必有义焉。”^⑭他提出的“志乃史体”，其主要核心意思是说，方志属史学的范畴；他提出的“志乃史裁”，其意主要是指编修地方志要为“国史要删”，为编写正史提供翔实的资料；他提出的“志属信史”，是提示修志者须遵“史家法度”，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他并未忽视在写史和修志中的殊同之别，如他提出编写地方志时也要有一个纵横结合问题。他认为：从纵的来讲，就要纵述始末，纵贯古今；从横的来讲，如天象、地理、纪传、礼乐、典政、食货、艺文、选举、职官等都要分门别类详记，使之成为一邑之史（志）。否则也就不是地方志了。章学诚先生还认为：“正史既存大体，而部府州县之志，以渐加详焉。所谓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州县博收，乃所以备